

# 自強要角張之洞

謝康

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  
滿眼蒼生，淒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

## ——王壬秋輓張之洞聯語

上面一副對聯的作者，湘潭王闈運，字壬秋，晚年自號湘綺老人，（西元一八三二—一九一六）是晚清著名大詩人，詞章家及經學家，歷主長沙、成都、衡州、武昌各大書院，欽賜翰林院侍



清末自強運動要角張之洞的照相。

讀學士。入民國，曾任國史館館長，民國五年卒。著有「湘軍志」及「湘綺樓全集」行世。他晚年眷戀僕婦周媽的故事，成為當時人笑談的資料。同治初年至光緒時代，他曾先後參加曾國藩、左宗棠及張之洞幕府，頗受尊重。其時曾、左、張三公的門下士，多因做過幕僚的關係而升官發財；而王湘綺則一介書生，不為富貴榮華着想。現在我們試一讀他輓張之洞的對聯，就知道他時時以天下國家為念；而張之洞平生志節及其助業

，也約略地從這副聯語內看得出來。（上半聯「騎箕」二字，係仙逝的意思。「箕尾」是一顆星的名字，「身騎箕尾歸天上」，這故事見莊子大宗師篇）闈運博學多才，措詞不同凡響。這副聯，雖簡單，但已道出張之洞的抱負和他自己與張氏的關係：「滿眼蒼生，淒然流涕，」流露出他的滿腔愛國熱忱！至於「整頓乾坤，」則早見於曾國藩輓翰林翼太夫人聯語，原聯云：「武昌居天下上游，看郎

君整頓乾坤，縱橫掃蕩三千里。陶母為女中人傑，痛仙馭永辭江漢，感激悲歌百萬家！」林翼時為湖北巡撫，坐鎮武昌多年，與曾代名臣陶侃的地位相同，故國藩聯語沿用陶母故事。張之洞為兩湖總督共十七八年，其地位略似陶侃及胡林翼，因此王壬秋輓張之洞的對聯，並沿用「整頓乾坤」字樣，是相當恰切的。

## 一·張之洞生平行誼

張之洞，字香濤，一字孝達，晚號「無競居士」取張九齡詩「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之義。清廷於其死後諡為文襄公。世人稱他為「張文襄」或「張南皮」，亦猶李鴻章之稱「李合肥」或「李文忠」，及「康南海」，「梁新會」的意思。他是直隸南皮縣人，清道光十七年（西元一八三七）八月初三日生。五歲入學塾有神童之譽。讀書甚勤，必求其解，讀九經畢，學為詩及古文辭。所學無常師，他的父親，是胡林翼的同年，因此，他嘗從林翼問學，又在貴州興義府署他的父親任所中受業於名師韓超，（此人後為貴州巡撫，與胡林翼友善）。十六歲時，以鄉試第一名（即「解元」）中舉。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二十七歲時，以一甲第三名（榜花）賜進士及第。更由於慈安、慈禧兩宮太后及大學士寶

鑒對他的賞識，於是聲名鵲起。原來他才思敏捷，明識政治的道理，又長於駢文及章奏，據說，下筆千言，好似有神助一樣。他的從堂兄張之萬做河南巡撫時，請之洞撰擬了兩篇奏疏稿，很博得慈禧的讚賞。

由同治三年至十三年之間，張之洞備位翰林院編修，當時所謂同治中興名臣，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駱秉章、曾國荃等，都已聲名顯赫，絕非之洞所能企及。但之洞因早著科名，博通今古，又有勇氣，言人之所不敢言。每有議論，一時名流及關心時政者，多佩服其胆識，世人因此稱呼他和他的「一班朋友們爲「清流」，名望也相當不錯。所謂「清流」者，因他們批評李鴻章繼曾國藩主持國政，在用人行政方面，好以利祿驅使那些求官做的人，論功利而不論氣節，論才能而不論人品，對於這種官場舊習氣，他們既然看不慣，於是口口聲聲，以維持倫理名教爲先務，認爲法制可以變，工藝器械，可以學習西人之所長，惟中國歷聖相傳之教不能變。這些在當時是頗爲大膽的議論，發表於光緒初年。到了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維新之時，之洞作「勸學篇」，所主張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說，似仍是這個一脈相傳的思想。這在下文，當另加以論述。

同治十三年，穆宗載淳駕崩，（據傳說由於花柳病的緣故，）兩宮太后懿旨（實則由慈禧專斷），立載湉繼成豐帝爲嗣皇帝，兩宮太后仍垂簾聽政，而大權實集於慈禧一身。慈禧既運用權謀，依李鴻章的淮軍實力爲後援，作威作福，這

迫了已有娠孕的同治皇后自殺，使同治帝絕後；同時宣佈俟將來光緒帝生子，即繼承同治之後，但光緒死後誰做皇帝，却是一個很多爭論的問題。慈禧於此，不想即行確定，以便她將來有伸縮餘地，恰好有張之洞的一封奏書，爲慈禧提出不明白確定將來誰作嗣君的理论基礎。這封奏書在之洞的本意，只想平息紛爭，團結一致，共體時艱。萬不料竟因此獲得慈禧的恩寵，開闢了他今後事業發皇的基礎，以後他所有的建議和設施，多半都能得到清廷的支持，和這封奏章，似乎有很大關係。

慈禧的攬權淫蕩，居心狠毒，有很多地方，類似唐朝的武則天，但她沒有武后的才具和膽識。武后可以明目張胆地養畜所謂「面首」者（即「男妾」之類）若干人以供她淫樂。而慈禧則半遮半掩或偷偷摸摸地寵幸安德海和李蓮英這些宦官，或者像榮祿這類的親貴。但是弄到她肚子大的時候，則非墮胎或人工流產不可了。這些最得寵幸的閹宦和俗臣，就是她的心肝寶貝，他們的行爲，有時或不免觸犯禁條，但因太后的支持，乃有所恃而無恐。當光緒六年十二月某日，有某中官（大監）率小太監二人，奉內廷命令挑食物八盒賜送醇親王官邸，（醇親王妻，即慈禧胞妹，）在出東華門時與守門的護軍爭毆，他們乃毀棄食物，回宮誣告護軍搶劫。慈禧因此大爲震怒，下令撤護軍統領的官職，士兵則交由刑部治罪，很可能判處死刑。因爲按照清宮的規定，宦官是不許出宮的，這是護軍方面的職責當然應該加以阻止。但是大監方面，則以爲是既然奉了「老佛

爺」的聖旨，誰也管他們不着，於是大胆地誣告護軍一狀，幾乎構成冤獄。陳寶琛、張之洞看到這種情形，太不像話，於是上疏請裁抑閹宦，其奏摺中指出：

閹宦恣橫，爲禍最烈。惟是兩次諭旨，俱無責戒太監之文。竊恐皇太后、皇上裁抑太監之心，臣能喻之，而太監等未必能喻聖心，恐將有藉口此案，恫喝朝列，妄作威福。如有懲辦太監，亦懇明白宣示，則聖心之公，國法之平，天威之赫，曉然昭著於天下。

這封奏摺呈上去之後，護軍方面，乃獲得從輕發落，張之洞和陳寶琛兩人曾舉行一次「慶功宴」，酌酒相賀。光緒七年，之洞升任山西巡撫，四年後，調升兩廣總督，又五年，調任湖廣總督，（兼巡撫）真是一帆風順，官運亨通。其後又奉命，任兩江總督兩年，並督辦商務。總計由光緒六年至三十一年，之洞外任疆臣，將近三十年之久，他所到的地方，都提倡建設，不遺餘力。他不僅是做大官，而且做了不少的大事。在北前後十八年督撫，所做的事最多，例如在武漢設兩湖書院，自強學堂，漢陽兵工廠，規劃京漢、川漢鐵路，督辦粵漢鐵路及造幣廠等。在廣州創辦廣雅書院，刻廣雅叢書，建立水師及陸軍學堂及槍砲廠。在南京（兩江總督任內）組織「江南自強軍」整頓江南製造局等。當庚子義和團之亂時，他正兼署理湖北提督，與劉坤一、李鴻章等聯絡外國領事訂立東南互保的臨時條約，使

長江及珠江流域各省，免於兵禍。我們由此可以說，張之洞在做總督的時代，所作的大事比較任何其他各省的總督為多。他原與李鴻章都以精勤幹練見重於清廷，慈禧太后對於他兩人，相當的信任。鴻章比他長十四歲，勳業名位高，也比他為早，有時不免以前輩自居，倚老賣老。之洞不服氣地批評鴻章（字少荃）說：

「少荃議和二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李鴻章聞言，亦反唇相譏曰：

「香港作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耳！」時人傳為笑料，認為這是一副很好的滑稽聯語。又張之洞在做京官時，曾彈劾劉坤一抽鴉片，身體虛弱，精神不振，把他的兩江總督給參掉了，其後因坤一不念舊嫌，兩人竟做了很要好的朋友，因為他倆都公忠體國，不挾持私怨，好像廉頗和藺相如交歡的故事一般，世人傳為美談。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他與張百熙等擬訂「新學制」，即所謂「奏定學堂章程」（一稱癸卯學制），也是清廷廢除科舉後首次興辦學堂的章程，筆者為兒童時所讀的小學堂，就是根據這個章程而設立的。一直到辛亥革命後民國成立，頒訂了「壬子學制」，這章程才廢止了。廢科舉，是中國教育史上劃時代的一件大事，而在張之洞、張百熙手上完成，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當時所頒教育宗旨，有五個要點：（一）忠君（二）尊孔（三）尚公（四）尚武（五）尚實，這些都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的觀念有關。從現在看來不免陳舊。但我們要知道這兩位姓張的，都是從考八股出身，而能主張廢八股，興學堂，實

在是很不容易的了。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以後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八月之洞逝世，這四年間是他在京師做大學士，軍機大臣，及學部（相當於教育部）大臣的時代，曾創辦京師圖書館。其後因與攝政王載灃不和，不安於位，氣憤成疾。臨死前對於國事很悲觀，認為大清帝國，已到了「亡國階段」，正如同王千秋晚聯說：「滿眼蒼生，淒然流涕」這兩句話也可形容張之洞對全國人民的關懷！這時候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勢力，日益高漲，兩年後（一九一一）的武昌起義，就在張之洞曾經坐鎮十餘年的地方爆發，而滿清很快的滅亡，果不出之洞的所料。據清史稿之洞本傳略謂：

「三十四年，督辦粵漢鐵路，德宗暨慈禧太后相繼崩殂，醇親王載灃監國攝政。之洞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逾年（即宣統元年），滿洲親貴漸用事，通私謁，議立海軍。之洞言海軍經費絀，可緩立，爭之不得（按即攝政王不採納他的意見）。適遇親貴薦津浦鐵路總辦人選，之洞說此人「不洽輿情」。攝政王曰：『輿情不屬又怎樣？』之洞曰：『民且激變。』攝政王曰：『吾不畏也，有兵在。』之洞退而歎曰：『不料今天竟聞亡國之言！』遂得病，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公），入祀賢良祠。：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不增一畝。」

又據清史記載：之洞是一個忠君愛國，肯做事而不愛錢的好官，當他做兩江總督時，有商人拜託一位道員獻白銀二十萬兩作為之洞的生日禮物，要求准許他在海州開礦，之洞拒而不納，並馬上劾罷這位道員，其操守的廉潔，在當時是很著名的。但因他所辦的事很多，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生息的角度看來，之洞好像未免多事，而且浪費了國家的財力了。所以在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四月有人彈劾他，說他所建設的廣雅書局，培植士林，差強人意，但規模不免太大，用錢太多了。其後調任湖北，開煤鐵各礦，浪費更多，迄無成效。這封彈章又說：「該督被皇太后皇上如此寵遇，而遲應妄行，一至如此。」及最後稱之洞不宜於做封疆大臣，只有衡文校藝，談經徵典，是其所長云。這個彈章對之洞極力攻擊，直欲置之死地。幸得劉坤一不記前嫌，於奉命查辦時，對於彈劾各點，盡力為他辯護，始得免於罪。俗諺說：「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又說：「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古詩句亦有云：「書生終日苦求官，做到官時步步難。」張之洞雖號稱「清流」，也可能有被投入「濁流」中的危險！所以有人說：做官難，做中國的官更難！

## 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張之洞短身巨髯，風儀峻整，大家知道，他

是晚清光緒朝一著名政治家，和教育思想家。他所著的「張文襄公全集」，（一稱抱冰堂集）內容除包含「翰軒語」、「書目答問」、「勸學篇」及若干詩文之外，以牽涉實際政治及教育制度的章奏為多。我們要瞭解之洞的政治思想及其對學術文化的見解，當以勸學篇為主要的參考資料。從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的簽訂，（五口通商，割讓香港）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滿清滅亡，時間共有七十年之久。這七十年中，外則帝國主義列強多方侵略，內則太平軍及捻匪等的戰亂。最後則革命黨人紛舉義旗，真是一波未平，二波又起，這時的國勢已非常岌岌了。加以同光兩帝，均是沖齡踐阼，受制於母后，環境所逼，形成虛君，而不能有所作為。而慈禧一人專政，近五十年之久。她因缺乏新知識，與頑固守舊勢力結合，沆瀣一氣，只求王朝和祿位的保全，不知謀國家的進步。幸賴曾、胡、左、李、奕訢、文祥諸大臣，苦心戮力，支撐危局。而翁同龢、李鴻藻、張之洞、劉坤一等，也有相當功勞，俱不愧大臣風度。至於從對國際形勢政治及社會思想時代潮流的認識而言。當時也有些開明進步之士，如容闈、何啟、胡禮垣等，但因他們不在朝廷，不能發生較大的影響力。（甲午年 國父會上書李鴻章，而不見用）或者雖有機會接近皇帝，鼓吹變法維新；（如康梁及六君子）畢竟敵不過慈禧領導下的保守頑固勢力，而終歸於失敗。

位在主張「革新」和「保守」的兩大派系當中，有一個影響力相當大的中間派或調和派的領導人物：這個人就是張之洞。他有一首七言絕詩

，以「新舊」二字命題，其詩云：

「璇宮憂國淚霑巾，朝士翻爭舊與新，門戶都忘薪胆事，調停頭白范純仁。」

說出他好像宋朝的范純仁一般，有意調停新舊之爭，而不立門戶。所謂「璇宮憂國」大概是指西太后而言。他所著的勸學篇，有兩句流傳很廣的名言：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他以尊孔、尊經，為學術的「本體」；以「西學、西藝」（例如科學技術之類）作為應用。他將「體」與「用」對比出來，表示中國學問，是藏於內的本體，是最重要、最寶貴的東西；西方學問則是表現於外的一種效用，是次要的東西。拿一棵樹木來比喻，本就是根幹，末就是樹杪或枝葉了。

張之洞這兩句響亮的口號，則是在光緒戊戌年（一八九八）著勸學篇時鄭重提出的。其實以西方技術為用，但不改變傳統思想，是從同治初年（一八六四）自強運動亦即洋務運動開始至戊戌維新前夕三十餘年間十分流行的口號。這種思想是繼承「師夷之長以制夷」的觀念而來。自鴉片戰爭失敗後，許多人以為西洋人之所長，只是船堅礮利而已，其他基本學問都是中國的好，只要我們的船堅礮利，就可以和他們對抗或制服他們。也就是用西洋的新發明，來維護中國的學術文化。李鴻章練北洋海軍，曾國藩在上海創設江南機器製造局（一八六五），都是以此種「求形下之器，衛形上之道」的思想做出發點的。到甲午戰爭後二年，（一八九六）工部尚書孫家鼐

倡議設立京師大學堂的奏疏中，已主張「今創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時在勸學篇出版前二年。可見中西學之說，並非之洞的創見。

如所週知：中國人認識西洋的軍事力量，始於鴉片戰爭時代，林則徐和魏源等早有「以夷制夷」的想法。其後洪楊之役，胡林翼為湖北巡撫時，湘軍包圍太平軍於安慶，林翼曾親往視師，當他騎着馬登上龍山，觀察地形時，很高興地說：「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逆賊雖強，不難平也。」接着他又騎馬到長江邊觀望，忽然看到兩條洋船，鼓輪溯江而上，其速度有如飄風快馬。胡公於是臉色大變，默然不出聲。在勒馬回營的路上，吐了一口鮮血，幾乎跌下馬來。他因受了這大刺激，氣出病來，不到幾個月，就死掉了。（據薛福成庸庵筆記）不久，湘軍克復安慶，曾國藩就首先設立一個造船廠，但所仿造的船，遠不及洋船的快捷。

張之洞繼承曾國藩、李鴻章之後辦理洋務，他雖以為除船堅礮利之外，西洋尚有許多科技可學，必須設立各級學堂。但他畢竟是科舉出身的人物，故同時創立「存古學堂」於武昌，以保存國粹。又著勸學篇，以說明他的教育宗旨及對於中西文化的看法。筆者本人探究近百年來中國社會變遷與西方文化束來的關係，（參六十年二月廿二日自立晚報所載我的講稿）認為張之洞時代雖在胡林翼、曾國藩之後，但仍是中國開始接受西學的啓蒙時期。此時儒家思想，仍瀰漫全國，大家都尊奉它為聖教，不敢有所非議。張之洞從

儒學出身，自幼飽讀聖賢之書，心中以為八股文可廢，而四書五經不可廢。又恐我國人懷疑西學有違聖教而不敢行，故特倡「中體西學」，亦可說是中西會通的說法。此則由於他底時代使然，無足深怪。他所說的「西學為用」，已經比較會國藩時代船堅礮利的思想邁進了一大步，除「西藝」外，他還主張兼學「西政」，開辦學堂及報館，派遣留學生，多翻譯西書，以開民智，增進知識而挽救危亡。以為國家欲用人才，則取之於學堂，而不能取之於科舉，蓋已深知八股文的流弊，非把它廢掉不可了。

國父孫先生所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於一九〇五年成立，當一九〇三年張之洞、張百熙等擬訂「奏定學堂章程」時，革命思潮已開始汎濫於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的各大都市，各種傳統觀念及制度，快要隨着政治革命君主專制政體的倒塌而發生動搖。蔣夢麟先生在「西潮」（頁一八七—一八八）上說：

「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事實上也不過是說：健全的胃，比較它所接受的食物，對健康更為重要。因此中國很想穩步前進，不敢放步飛奔。但是，西方文化潮流，却不肯等待她。西潮衝激她底海岸：到了一九〇二年，胃口最佳的學生們，已為時代精神所沾染，『革命』成為新一代的口頭禪：他們如饑如渴地追求西方觀念，想藉此抵消傳統的各種影

響。：

「五四運動時代中國文化的羅盤針，指向西方文化的主流，使中國文化史隨之而轉入新頁。也可說根本改變了張之洞所提倡的「中體西用」態度。五四以來，文化思想改變，教育制度也隨着改變。如今反對「五四」反對胡適思想的人，多半還是受着張之洞思想的影響。：」

夢麟先生這番話，可代表擁護民主革命及五四時代極力主張西化（或現代化）以及今日主張反傳統的一批人的論調。因為張之洞對西方文化，並不十分了解，對中國學問之「體」也說得含糊不清，他說：

「以中學治身心，以西學應世事：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一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淪其知識，練其技能，務期他日成材，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見重訂學堂章程奏摺）

這裡他把「中學」縮小到中國經史之學及忠孝之德這些範圍之內。又說：「吸收西政西學，必無背於經義，無損於聖教。」這豈不是把儒家經典以外的諸子百家及固有的科學、工藝、美術、文學等一概都不算是「中學」了嗎？又僅僅是「忠孝」也不能概括中國固有的全部道德文化。張之

洞對中國學問的這種看法，早已引起許多爭論了。他又說必須是無損於聖教，不背於經義的西學才可以吸收。這些話也是有問題的。因為中西文化來源不同，全部西學之中（包含基督教在內）不合於中國儒家經典的，真不知有多少。例如：自由平等的觀念，就和「三綱」之說衝突，民權思想，與經義中尊君的思想不合。個人主義與家族主義衝突，「七出」與近代西方的婚姻觀念及小家庭制度不相容。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參勸學內篇明綱）照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以中學為本，西學為末；中學為主體，西學為輔助；中學在先學習，西學在後學習。總括他的意見，仍是側重中國儒家的學問，一個人必須儒學先有根柢，然後可以學西學。在這先後緩急的次序當中，表示出這兩種學問的輕重和主從的關係。如果我們將這兩種學問不分先後同時學習（例如在香港，許多中小學、中文科，不及英文課程之多，又如在台灣的醫科、工科，課本幾乎全用英文），那必定是張之洞所不贊同的。勸學篇於光緒二十四年初印於兩湖書院。其後由清廷詔令頒行全國，各省翻印的很多，「中體西學」成了官方正式承認的一種思想。但其後批評這種思想的也不少，嚴復便是其中之一。

基於中體西用，中先西後的同樣理由，張之洞反對「幼童留學」（在一八六〇年代，曾國藩、李鴻章會經奏准清政府派遣一百多名幼童赴美留學，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名），因為幼童年齡太小，沒有「中學」根柢，而且模仿性強，容易接受西方文化，變成一個「外國人」。他在勸



學篇「遊學」節裏說：

「或謂昔嘗遣幼童赴美學習矣，何以無效？曰：失之幼也。」

之洞對於「留學」（他稱之為「遊學」）有幾點特別與人不見解。他以為「遊學」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見同上勸學篇遊學節）誰都知道留學政策，和國家的現代化，其關係非常密切。從前西化論者，多主張幼童留學；中國本位文化論者必然加以反對，而主張在國內大學畢業後，做過幾年事的，才適合於留學。前者可說是「科班出身」，但中國東西懂得太少，正如張之洞所說：「幼童不如通人。」後者可說是「半路出家」一般來說，這種人外國語文程度都比不上「幼童留學」。但因中國東西，已有了根柢，留學多年之後，可能成為貫通中外的「通人」，而不僅成爲一個不太懂中國文化的「洋翰林」或僅有一藝之長的所謂「專家學者」。因此張之洞認爲「幼童留學」，不如「通人留學」是有相當見地的。在他死後七十年的今天，我們的留學政策，早已不採取幼童留學，和張氏當日的主張，不謀而合了。

至於他說：「庶僚不如親貴」意思是遣送普通的公務員留學，其成績將會不如皇親國戚或達官貴人留學，這種想法，絕不適合於民主時代的要求，簡直是笑話而已，「應毋庸議」不必多談。他又說「留學日本，勝過西洋」。他的理由却有幾點：第一、是省錢；第二、是路近，便於派人考察；第三、是日文接近中文，容易學習；

第四、是「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日情勢風俗相近，易於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他這四項理由，前三項，我們都容易理解，實際上在甲午戰爭後至戊戌維新的時候，我國留東學生人數激增，已超過西洋留學的總人數好幾倍以上。那時東京的生活費和上海差不多。從上海放洋到日本長崎，其航程約略等於香港到上海的一半。路程既然這麼近，而且出入境不須驗護照，等於到中國內地旅行。而日文比歐美文字容易學，所謂同文同種，一切都比較留學歐美各國，來得近便而且親切。所以不待滿清政府和張之洞的提倡，留日學生已極一時之盛了。

張之洞勸人留學日本的第四點理由，却未免是方便懶人的說法，爲什麼是方便懶人呢？因爲他說：西洋的書籍很繁，要經由日本翻譯家將那「不切要」的「刪節而酌改」之後，譯成了日文，我們中國留日學生可將這些日文節譯本拿來讀，就可以「事半功倍」不必費精神讀那些勞什子的蟹形文字了。這個辦法，不是方便懶人是什麼？我以為照他這種天真的構想，推論下去：只學日本文，不學西方文學；只讀日本人從西方書籍翻譯過來的東西，而不必讀原本；日本人不曾翻譯的西書，我們就不能讀，日本人翻譯錯了的，我們只好以訛傳訛。（因爲不懂西洋文字）我們在近代學術上，將永遠跟着日本走，永遠作日本人的徒弟和附庸。我國要現代化，只學到東洋化；這麼一來，我們非甘拜日本的下風不可了。張之洞又說：「中日情勢風俗相近，易於仿行，事

半功倍。」他的意思非常明顯要我們模仿日本，就可以「事半功倍」，換句話說：我們模仿日本，日本模仿歐美，在我們這是間接的模仿，而不是直接的模仿。模仿同文同種的國家，自然是比模仿那異文異種的國家來得容易一點。但俗諺有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只得乎下。」經過七折八扣以後間接的模仿所得，能說是「事半功倍」嗎？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我懷疑如果照張之洞這種「模仿日本」的主張來實行，那麼，他的中體西用，非變成「中體東用」不可了。（東用，就是以東洋日本所學到的東西爲用）。

關於「中體西用」牽涉到整個如何保存傳統及國家現代化的許多問題，談的人很多，談了好幾十年，但沒有一致的結論。因爲題目太大了。可參考的資料也太多了。非本文所能論斷。和張之洞同時的先覺之士如留英前輩 國父的老師何啓，（香港西醫書院創辦人兼教授）曾於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之間，在香港報上發表「張之洞之批評」及「勸學篇書後」他主張中國應該全面革新，而不同情張之洞的中學爲體的見解。平心而論，以張之洞的學歷，平生足跡不出國門，又不懂任何一種外國語文，他如何能認識「西學」之「體」？甚至在科技的應用方面，也弄不清楚，嚴格說來，他那裏有資格談什麼「西學」？！

### 三、張之洞軼事一束

中國近代大教育家蔡元培，其年齡小於張之

洞三十歲，但他的思想却比之洞前進三十餘年，當辛丑條約（一九〇一）簽訂之前，蔡元培擔任南洋公學總教習時，已提倡女權，是年多即創辦愛國女學於上海。張之洞於光緒二十八年奏定壬寅癸卯學制時，雖然廢除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仿照外國，普遍設立學堂，但仍不免保持着重男輕女的舊觀念，極力反對設立女子學堂。他以爲少年女子絕不應該結隊入學，拋頭露面，遊行於街市。（因爲古禮：女子十歲不出門）更不宜多讀西書，誤學外國習俗，以致自行選擇配偶，（按即「婚姻自主」）養成蔑視父母及丈夫的風氣。所以女子只能受家庭教育，而不應受學校教育，只要受母親或保姆之教，粗識文字、書算、家政及女工應做的事就夠了。從這件事，可知張之洞仍是舊時代人物，腦筋中充滿了男女有別，「夫爲妻綱，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直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受了新潮流的衝激，他才開始改變了他從前反對設立女校的主張。那時他身爲教育部長（學部大臣），才知道「開辦女學，在時政爲必要之圖。」同時由於這些年來北京以外的官商士民創立女學的已不少，逼着政府方面，也不得不開放女禁了。但所謂女學，仍以女子師範及女子小學堂這兩種女學爲限。直至民國初年，男女小學，都是分別設立，男女不同校的。（在張之洞奏定設立女子小學堂後十二年，即民國八年五四運動那時候，筆者擔任本鄉「柳城縣立模範高等小學」校長，仍是男子小學。女子小學則單獨設立，門禁森嚴，給我很深刻的「男女有別」的印象。）我想：張之洞

，是黃河流域的人，（雖然他生在貴州，他父親的官署內），蔡元培是長江以南的人，由於這兩位教育思想家生長的地理環境不同，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思想。一般來說，北方人比較穩健保守，南方人比較活潑進取，所以從洪楊起事到國民革命軍北伐，這幾十年間，領導革命的大概都是南方人。再拿張之洞殺唐才常這件事來說，他還可說是個一生忠於滿清的反革命分子。因此何啓、胡禮垣、鄭觀應、馬相伯、梁啟超、黃公度這些維新派人物，對他都沒有好感。

然而張之洞畢竟是愛國的「純臣」，從他反對李鴻章一手簽訂的馬關條約和爲阻止割讓台灣而奮鬥，這兩件事，也可以看得出來。原來他爲着割台事，非常着急，曾經屢次疏奏清廷，並電請李鴻章千萬不要同意日方提出割遼東半島及台灣的要求。他認爲「中國如北無旅順，南無台灣，則中華海面，全爲彼邦所扼，此後雖有水師，何從施展！此約一成，將爲萬世子孫之害，中國非但不能再談自強，深恐自存自立皆不可得。」他這種主張，在他的全集電牘中可以見到。當光緒二十一年二三月間中日代表在馬關議和時，雙方同意停戰二十一天，但台灣澎湖不包括在停戰地區之內，二月二十九日（陰曆乙未年），日軍攻陷澎湖，張之洞即秘密電知唐景崧、劉永福撥給步槍一千六百餘枝，子彈一百餘萬發及軍餉若干，支持台灣軍民抗戰。同時並電達我國駐英、法、俄、德各國公使，盡力爭取各國協助，脅迫日本，使其放棄割地的要求。當時駐法公使王之春，本已與法國外交部初步協議，決定由法援助

我國，不批准割地條款。不料駐英公使龔照瑗，是李鴻章的親信，他忽然由倫敦來到巴黎，使此事敗於垂成，至爲可惜。清廷昏庸顛覆，柔懦不振，爲暫時偷安之計，乃決意割台。之洞亦無可如何。只有暗中籌謀，以期能多少幫助唐景崧、劉永福及台灣大紳士丘逢甲、林朝棟等守台抗日而已。唐劉等先後被公舉爲「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受任於匆促之際，撐持一艱危之局，卒以大勢已去，獨力難支，而永福的處境，最爲艱苦。永福雖有從前中法之役「劉二打番鬼」的精神，但亦無力達成張之洞及許多愛國人士的厚望。臨離台時，他的參軍記室吳桐林有詩爲證：

「話到君山涕淚多，秦廷愧我幾番過。  
三千士卒埋荒塚，百萬生靈葬海波。  
漫說興亡歸氣數，休憑強弱論中倭。  
兵窮食盡孤城在，空使將軍喚奈何！」

滿清政府在日本壓力下斷送了台灣，更引起愛國同胞和革命志士的反感。譚嗣同即其中的一人。嗣同後來寫了一部「仁學」即稱爲「台灣人所著書」但他於戊戌政變時殺身成仁，終不及看到台灣重歸中國的懷抱！

張之洞於十五歲時參加鄉試，考中舉人第一名，稱爲「解元」。他家照例大排筵席，宴請親友，熱鬧一番。當時之洞自己作了一副對聯，貼在頭門上，這聯語說：

「上巳之前，猶是夫人自稱曰；

中秋而後，居然君子不以言。」

這是用兩句歇後語作成的。上聯的「上巳」，是陰曆三月初三，從前科舉時代童生秀才，就在這個季節，禮記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乃自謙之詞。下聯「中秋而後」是指清代各省鄉試，規定在中秋節那幾天，又古書稱「君子不以言舉人」。這副對聯，翻成白話文，就是說：「我在三月初三以前，還是個童生；中秋以後，却成爲舉人了。」只是自我介紹，沒有別的意思，妙處是用的歇後語，表示作者的一點小聰明。

其後張之洞雖然做了大官，生活還相當樸素。他的姨太太們衣服最樸實的，最得他寵愛。不過當時大官們的姬妾，多崇尚奢侈，相習成風，否則被認爲太寒素，不好意思見人。張家的生活習慣，雖以儉樸著名。但爲着應酬親戚間的約會，之洞的姨太太，於出門時經常穿着布衣，另在轎中換上一套比較華美的衣飾，然後拾到親友之家赴宴；回程時則在轎中換回原來的布衣服回家。同時家中人互相約定，不許對之洞洩漏這個秘密。結果他老是被蒙在鼓裏。

之洞好讀書，平日手不釋卷，在其所著「書目答問」中，可知其學養功夫和涉獵之廣。但在中年以後身體「發福」，也很能睡。有時手握一卷，尚未終篇，他已經閉眼睡着了。據說有某道員，偶因要事進謁，只略談幾句，之洞便已執卷枕几而眠，這道員因話未談完，尚須請示，不敢退出，只有耐心靜候；等他一覺醒來時，已見滿壁燈火，乃得繼續談完。此人辭出後自歎晦氣說

：「今天喫的苦，比挨打十板屁股，還要難過。」又當雜髮匠來衙門內替之洞剃頭時，有時尚未剃完，他已經睡着了。剃頭匠只好站着等候，不敢離去。特別在廣州時，因天氣炎熱，使他更容易入睡。（那時沒有「理髮」「美容」這類名詞，理髮師叫做「剃頭匠。」）

王王秋（閩運），以詩名家，也很會作對聯。北京城西南隅，有陶然亭，爲士大夫讌遊的所在。有一天張之洞和王王秋相會於陶然亭，張指「陶然亭」三字索對，王不假思索，即以「張之洞」三字作對，張點頭稱善。一會兒，這兩位詩翁走出陶然亭散步，見遠處有開通溝渠的工人，在那裏工作。張乃以「臭水溝」三字，請王秋作對子，王秋應以「張香濤」三字，彼此又大笑不止。按上一聯以張之洞對陶然亭，兩者俱爲專名，而拆開來說：陶張都是姓氏，之然則爲虛字，洞與亭又都是建築物一類，以此作對，較下聯似更爲工穩；而王的才思敏捷，特爲張所賞識，也可從這些地方看得出來。又光緒癸丑學制中「京師大學堂章程」乃係張之洞所手訂，有人覺得這個章程過於嚴密，清室某一親王，曾經批評說：「照這樣子，只好關門算了。」好事者乃以「關了門」對「張之洞」，似較上述陶然亭一聯更爲現成而貼切了。

中國一向是「文人相輕」派別紛歧的國家，雖在專制王朝，亦暗中鬧派系。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久已成爲習慣了，只有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才很少結成營私的朋黨。然有時亦或不免於被人譏諷。如曾紀澤辦對俄外交，得還伊犁，功

在國家，時論對他甚爲推崇。但因他在外國做公使的日子久了，起居習慣，都帶有歐洲的生活方式。其全家婦女兒童，都穿着西裝革履，洋派十足。但當時守舊的風氣，仍然瀰漫京師，士大夫們見紀澤侍郎家如此，不免譁然以爲怪異。所謂理學家者流，對這種情形，更看不順眼。於是社會上誹語流傳：說他父親以道學著名，而做兒子的不能善繼先人之德，乃至「用夷變夏」，實在對不起他的祖先云云。這種輿論，對他很不利，高陽李鴻藻（李石曾先生的父親）當時做大學士兼軍機大臣，也不喜歡曾紀澤這種西化作風。紀澤因此鬱鬱不得志，回國數年，不見大用，年齡僅僅五十出頭而死，這是當時受譏諷制裁的一例。至於張之洞的受謗，則更甚於此。有筆名「第一傷心人」的，作一長聯，對他極意毀謗云：

「籌餉局，總攬江漢利權，貪酷承家，乃父死於金（吞金死），乃兄死於煙（吞煙死），乃妻死於錫（據傳張以脚踢死其妻），乃子死於水（在南京溺水死），乃孫死於馬（一孫子墜馬死於武昌），而已猶爲蠶尾。（按蠶是一種毒蟲蝸子之類）

勸學篇，暗助康梁新黨，昧良誤國，有君受其欺，有臣受其戮，有民受其禍，（指其設立官錢局騙錢）有商受其害，有物受其毀，此人真是狼心！此聯幾乎全用謾罵口吻寫成，語極刻毒，其中若干句子，並作人身攻擊，是否全根據事實，現在



就很難查考了。但咒罵張之洞為毒蟲的尾巴，（鬻尾），又說勸學篇為暗助康梁而作，則未免太過火太冤枉，完全不合於事實。此聯乃根據柴萼梵天廬卷七轉載，作者自稱「第一傷心人」，但不知其真實姓名。按甲午戰敗後，至戊戌維新這幾年間，擁護光緒帝的翁同龢派與康梁等的維新派合作，勉強造成「百日維新」之局。張之洞本係自強運動的洋務派要角。並不是完全贊同變法維新的。他雖則和維新派有交往，但在新舊兩派之間，仍屬中間偏右的，又由於他本人素為慈禧所信任，所以在「帝黨」與「太后黨」互相爭權鬥法的時候，他深知慈禧榮祿和袁世凱一批人的實力雄厚，絕非軟弱的光緒所能敵。故作「勸學篇」表示他個人折衷的見解，和康梁等有不同的看法。這個事實，似乎被這個自稱「第一傷心人」的作者所忽略了。他對張氏，可能有什麼仇恨（？）；也說不定呢！

張之洞幕府裏面，有很多知名的文人，他死後的哀輓文字當然不少。除本篇開頭所引王王秋一聯外，詩人樊樊山（增祥）聯云：

「取海內六大邦政藝，豁中華二千年頹蒙，弱者使強，愚者使智。  
有晏嬰三十年狐裘，無孔明八百株桑樹，公而忘私，國而忘家！」

這一聯的上半，說他能採用西洋的政教技藝，以圖自強；下半聯讚美他的生活儉約，為公不為私，去世後沒有什麼遺產，證明他居官非常廉潔，這和上面所引的「第一傷心人」那一聯，謾罵他

「貪酷承家」及設立官錢局，騙取百姓的錢以入私囊的話，剛剛相反。從前三國蜀漢諸葛丞相逝世前曾預留一篇奏疏，使人於他死後奏明劉後主，其中說到「他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諸葛亮一生盡瘁國事，不治私產，亮節高風，誰不佩服？但仍「有桑八百株」，今張之洞連這份私產都沒有，其清廉又為何如？樊樊山又引齊國宰相晏嬰一件狐裘穿着了三十年，都不肯換新的，這個故事，也是用來比喻張之洞的生活儉約。

另一副輓張之洞的對聯是梁鼎芬作的，聯云：

「為學通漢宋，為政貫中西，一代大師成相業。  
其心質鬼神，其才兼文武，九州公論在人間。」

此聯對張氏的學問事功，更是揄揚備至，並認為他的心地光明正大，可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怍。這些話是否恰如其分量，抑或不免有些誇大，那就很難說了。俗語說：「蓋棺論定。」但歷史人物，牽涉到各方面，是很難論定的。梁鼎芬，字星海，號節庵，番禺人，前清光緒六年（一八八〇）翰林，因彈劾北洋大臣李鴻章誤國，而受降級的處分。其後又劾袁世凱，認為他像曹操和劉裕，有篡奪帝位的野心，可見他對清朝是個忠心耿耿正直敢言且有先見之明的人。他很受知於張之洞，曾任武昌府知府及湖北臬司（按察使）及布政使官等職，律詩及絕句俱佳，與張之洞、樊

樊山、陳伯嚴等常相唱和，成為詩友。

輓聯中，有一首的語句，頗幽默，亦可概括張氏的生平，聯云：

「無一日不辦事，無一事不用心，疆寄三十年，僅乃如此。」

行治術十之六，行學術十之四，存詩五百首，嗚呼哀哉！」

原來這副對聯，完全是摘錄張公哀啓中的句子而寫成的，雖然沒啥意思，但確係實錄，可供談助之用。

據說張之洞於牲畜類中，最愛牛，也自比於牛，以為牛的道德高尚，很像人類中的君子。他自從二十七歲中進士，點翰林，盡瘁國事四十餘年，任勞任怨，從不偷懶休息，真是「無一日不辦事，無一事不用心。」而且有操守，有擔當，不講求享受，他這種儒家精神，絕不是一般敷衍塞責的官場作風所能比擬的了。

## 民初三湘人物

（原名新湘軍志）

胡耐安教授著 定價台幣30元

革命湘軍掌故軼事

關心革命史事的人尤其湖南朋友，都該值得一讀。